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中国近现代史 基本问题研究



ZHONG GUO JIN XIAN DAI SHI JI BEN WEN TI YAN JIU

主编 杜君 吴蓓 王金艳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史 基本问题研究

主编 杜君 吴蔚 王金艳
副主编 张中国 陈松友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杜君, 吴蓓, 王金艳主编.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5601 - 5253 - 0

I . ①中… II . ①杜…②吴…③王… III . ①中国—近代史—研究

②中国—现代史—研究 IV . ①K250. 7 ②K260.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40802 号

书 名：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作 者：杜君 吴蓓 王金艳 主编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刘冠宏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18. 25 **字数：**330 千字

ISBN 978 - 7 - 5601 - 5253 - 0

封面设计：李岩冰

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 印刷

2010 年 1 月 第 1 版

2010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38. 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 址：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130021

发行部电话：0431 - 88499826

网 址：<http://www.jlup.com.cn>

E-mail：jlup@mail.jlu.edu.cn

前 言

2008年4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出通知：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逐步形成一个研究对象明确、功能定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同时，为进一步强化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功能和教师队伍建设，决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增设一个二级学科，即“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的通知明确规定：“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是围绕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的发展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由谁来领导等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专门系统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规律和主要经验的学科。”这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的性质和功能作出的科学定位。

从上述通知和规定出发，我们组织部分教师编写了《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一书。本书阐述的主要内容有：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三个选择”使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使中华民族走上了伟大的复兴之路。

本书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观点新，结构合理，领域宽，叙议结合，资料翔实，可读性强。该书对本学科及相关学科教师、学生和社会广大读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目 录

第一章 近代中国社会	1
第一节 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	2
一、 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2
二、 趋于解体的自然经济	7
三、 官僚资本的形成和发展	9
四、 外国资本主义企业	10
第二节 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结构	14
一、 传统的专制皇权逐渐削弱	14
二、 列强对清廷的全面控制与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	15
三、 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尝试与破产	18
四、 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21
第三节 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结构	23
一、 传统文化的衰微	23
二、 中西文化的碰撞融汇	25
第二章 中国先进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33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33
一、 在向西方寻求真理中碰壁	33
二、 早期对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介绍	35
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41
四、 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	50
五、 马克思主义被接受的原因	52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结果	56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56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	59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63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	69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69

一、	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	69
二、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72
三、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74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确立的历史过程	76
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确立的历史必然性	76
二、	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确立的历史过程	78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巩固	85
一、	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85
二、	领导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并取得重大成就	87
第四章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诞生	95
第一节	传统政治制度的解体	95
一、	传统政治制度的解体	95
二、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实施	96
三、	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制度	101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的创立	105
一、	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	105
二、	抗日民主政权的政治制度	108
三、	人民民主政权的政治制度	110
第三节	新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112
一、	过渡时期的国家政治制度	112
二、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设历程	114
第五章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	123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及其在全国范围的建立	123
一、	新民主主义经济在根据地的建立	123
二、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构想	128
三、	新民主主义经济在全国范围的发展	130
第二节	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的伟大变革	135
一、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135
二、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	136
三、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137
四、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	139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建	141
一、	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程	141
二、	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意义	143
第六章	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创建	146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诞生	146

一、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道路的开辟	146
二、	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147
三、	新民主主义文化在革命战争实践中的发展	153
第二节	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创建	159
一、	由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	159
二、	过渡时期文化建设的成就	161
三、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曲折发展与严重挫折	165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168
一、	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完善	168
二、	新时期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	169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171
四、	新时期我国文化建设的辉煌成就	178
第七章	当代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	187
第一节	生活水平从贫困到小康的历史跨越	187
一、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	187
二、	居民生活质量明显改善	190
三、	居民物质精神生活丰富多彩	191
四、	居民的社会医疗卫生保障条件大为改善	192
五、	居民就业社会保障明显扩大与提高	192
第二节	生活内容从单调到多彩的不断变化	193
一、	衣食住行的变化	193
二、	娱乐活动的多姿多彩	196
三、	岁时节日的新旧融合	200
第三节	生活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202
一、	由群体本位到个体本位	203
二、	由生产到生活	206
三、	婚姻家庭观念的巨大变革	208
第四节	生活方式由鄙陋到文明的革新	214
一、	人生礼仪民俗的继承延续与革新	214
二、	社会恶风陋俗的涤荡与改造	220
三、	社会风尚的改造	227
第八章	当代中国的外交和国际战略	231
第一节	新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的形成与发展	231
一、	近代中国的屈辱外交	231
二、	新中国外交方针和国际战略的形成	235
三、	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	236

四、	“一边倒”与划分“三个世界”的国际战略方针	237
五、	毛泽东关于外交和国际战略的贡献及其意义	238
第二节	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中国外交	239
一、	邓小平对毛泽东外交和国际战略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240
二、	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论断	241
三、	对外开放的战略思想	242
四、	建立国际新秩序	243
五、	邓小平的外交与国际战略思想的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244
第三节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	245
一、	世纪之交中国的外交战略	246
二、	建设和谐世界	249
三、	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	251
第九章	当代中国的国防与国家统一	254
第一节	当代中国的国防建设	254
一、	旧中国的国防状况	254
二、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国防建设	260
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国防建设	266
第二节	中国的国家统一	274
一、	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家统一问题的基本构想	274
二、	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统一的进程及成就	278
后记		283

第一章 近代中国社会

在世界的东方，有一片广袤而丰饶的土地，那里生存着一群黄皮肤黑眼睛的华夏儿女，在长江黄河的哺育下，他们世世代代生息繁衍在这片美丽的家园。千百年来，这个伟大的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勇敢和聪明才智创造了光辉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作出过杰出的贡献。

但是，当历史的车轮前进到了近代，当古老的中国依然迈着它沉重的脚步缓缓前行时，世界历史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1640年，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一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此后一些西方国家先后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社会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对此，《共产党宣言》有过高度的评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大大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促进了精神文明的发展，这是资产阶级对人类历史作出的巨大贡献。但是这种进步是以掠夺本国和殖民地人民为代价的，侵略和扩张是资产阶级的本性，正如列宁所深刻揭示的：“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①

而在这一历史时段，中国已告别了它光辉而荣耀的过去，变成了一个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文化专制的衰朽帝国。于是，她美丽的家园，辽阔的土地，丰富的物产，成了西方列强侵略的最佳选择。遗憾的是，这个古老的民族在灾难来临之际，依旧浑然不知，依旧沉迷在天朝帝国、夜郎自大的迷梦中。伴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这个东方古国的大门一步步洞开，本已步履蹒跚的封建帝国停滞了它前进的脚步，开始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深渊。从此，中国近代史打开了它百余年的屈辱篇章。

在这个漫长而灾难频发的历史进程中，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的不断加深，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变化。

^①《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47页。

第一节 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专制国家。鸦片战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不断入侵，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对此，《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作了深刻分析：“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然逐渐遭到破坏，但封建的土地关系，即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官僚买办资本和高利贷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仍占明显的优势。外国在华资本和依附于它的官僚买办资本垄断了国民经济的命脉，使中国在经济上日渐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附庸。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某些发展，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的多重压迫下，它没有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十分落后。”^① 应当说，这段论述是非常全面而精准的。

一、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于 19 世纪 70 年代。根据《中国近代工业史料》统计，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工业是从 1872 年开始的。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主要产生自两个方面，一是由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和华侨直接投资兴办的近代工矿企业；一是由原手工业作坊、手工工场逐渐转变为近代工矿企业的。这种经济成分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中小资本，代表着近代中国社会中比较进步的生产关系。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曲折的过程。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开始了初步发展。经过中法、中日两次战争的失败，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中，曾以老大帝国自居的大清王朝竟惨败于小国日本，并被迫签订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赔款最多的《马关条约》，使天朝帝国的脸面丢失殆尽，中华民族的尊严荡然无存，这种令国人难以接受的奇耻大辱，在中国朝野上下引起了剧烈的震荡。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更为严重的是，日本的贪婪野心，引发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把本已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推向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面对这种深刻的民族危机，一些爱国人士把采用西方科学技术、发展民族工业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1 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1 页。

作为救亡图存的手段，要求兴办实业的呼声日益强烈。1895年6月，顺天府尹胡橘棻在《变法自强疏》里说：“中国欲借官厂制器，虽百年亦终无起色。必须准各省广开民厂，令民间自为讲求。”^①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和其后的几次上皇帝书里，都提出奖励、保护民间兴办企业的要求。面对国内外的巨大压力，清政府也被迫采取一些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必要措施，1895年6月5日，清政府以“电旨”方式“饬令招商，多设织布、纺绸等局，广为制造”，从而形成了清末民间兴办实业的热潮。20世纪初，由于清政府开始举办“新政”，成立了商部，制定了多项保护和奖励工商业的法律、法规、章程，并实行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民族资本主义继续得到发展。据统计，从1895年到1913年，开设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达到549家，与此同时，民族资本经营的金融业、商业等行业也有所发展，1911年，华商开设的银行共有17家。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势头在辛亥革命以后得到了继续保持。辛亥革命这场中国历史上深刻的社会变革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对发展民族工商业十分重视，他认为：“现在民国大局已定，亟当振兴实业，改良商货，方于国计民生，有所裨益”，“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② 在孙中山的推动下，在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短暂历程中，制定和颁布了一些符合工商业者利益、有利于实业发展的政策，并采取了不少具体措施。例如，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就在中央设立了实业部，作为执掌全国实业要务的最高领导机关，同时，南京临时政府还设立了与实业紧密相关的交通部和财政部。南京临时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和法令，如《公司条例》、《矿业条例》、《审查矿商资格细则》等，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久，发布了《保护人民财产令》，该法令明确规定保护人民的一切私有财产。此外，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十分明确地规定要保护人民有财产和营业的自由，新颁布的商业注册章程还减免了注册费用，准许各类商号自由注册。这些法令和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清政府时期束缚民族资本发展的障碍，有利地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作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本人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充满希望，而且身体力行，为振兴中国经济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在《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中写道：“中国处在大规模的工业发展的前夜，商业也将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再过50年我们将有许多上海。”^③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亲自

^①《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第282页。

^②《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47页。

^③《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6页。

主持制定了《实业计划》。在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他以极大的热情，宏伟的气魄，为振兴实业实现中华现代化而奔走呼吁。他到处宣传“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重要之政策”，是关乎国家存亡、民族兴衰的根本大业。他在上海设立铁路公司，亲自担任全国铁路督办、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会长、中华实业联合会会长、中华实业银行名誉总董等职位。孙中山的辛勤努力极大地推动了实业的发展。这期间，还成立了许多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组织和团体，如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等全国性的经济团体和西北实业协会及安徽、黑龙江实业协会等地方性的经济组织。华侨也组织了团体如同仁民生实业会等，积极回国投资兴办实业。在此期间，在革命势力活跃的上海、湖北、福建、广东、浙江等地，地方政府也制定了一些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在这一时期，振兴实业发展经济成为代表社会进步的思潮，所有这些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氛围。据《农商部统计报告》，辛亥革命前的设厂数量，1910年为986家，1911年为787家。辛亥革命后，1912年为1504家，1913年为1378家，1914年为1123家。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民族资本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与此同时，为反对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中国各阶层民众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也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一时间，出现了“自由”、“进步”、“无敌”、“醒狮”等富有爱国意义的商标。在这种背景下，民族工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896到1913年的18年中，在中国建成的纯华资的纺织工厂仅有16家，纺锭数在1913年才达484192枚。而在一战期间及稍后，从1914到1922年的9年里，纯由华资开设的纱布厂即达54家，开工的纺锭在1922年达1506634枚。除开设新厂外，原有工厂的扩大也很普遍。“1906年所建的无锡振新纱厂，经营七八年，并无重要发展，惟到了1919—1920年，股东红利曾高达6分之多。又同年所建的宁波和丰纱厂，战前本难于维持的，但在1919年该厂竟以90万元的资本获净利润达125万元，1920年获利尤在此数以上。”^①

1912年至1922年的10年间，民族资本发展的势头高涨，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从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到辛亥革命爆发时的40余年间，资本总额共为1.3亿元，而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到1918年的7年间，新增资本就达到了1.3到1.4亿元。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工业无论从设厂数目、投资规模还是增长速度方面看，都是发展最快的，从1914年到1919年，民族资本共设新厂矿379家，平均每年63家，新投资本8580万元，平均每年1430万元，年平均设厂数和投资额均比此前

^①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85页。

19年间增长一倍以上。从1913年到1920年，民族资本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54%。民族资本在全国产业资本中的比重，由1913年的16%增至1920年的22%。与民族资本发展相适应，民族商业资本的发展也比较快，据北京政府农商部统计，在全国，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商业公司，1914年有169家，1915年206家，1916年则达到220家。

但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生存环境极为恶劣，其首要大敌就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时，一方面破坏了封建自然经济结构，刺激和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另一方面，又严重地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通过贷款、投资等方式，控制和兼并民族资本企业，如1895年创办的裕晋纱厂，到1897年即被外国资本所吞并。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也没有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压迫。在一些主要工业部门，外国资本仍然超过本国资本，如日本资本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全国钢铁生产能力的94%。一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民族工业很快转为停滞萧条，所谓黄金时代只不过是昙花一现。

民族资本还饱受本国封建势力的摧残。由官僚绅士而成为资本家的张謇说，清朝当局“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张謇从1895年开始筹办南通大生纱厂，由于官府设置种种障碍，直到1899年才建成。张謇曾中过状元，虽没有做过大官，却也是地方绅士中的头面人物，与许多显赫的大员都有来往，这样一个有身份地位的人在办实业的过程中都感到困难重重，那些没有任何背景的人要办工业，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民族企业不仅要承受大小官员各级衙门的层层敲诈勒索，还得承受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进口的洋货只要缴纳7.5%的正税和子口税就可以畅通无阻，而国货却要逢关纳税，遇卡抽厘，如福建各地的茶叶经由福州出口，所纳的各项厘金和出口税高达35%。张之洞对此深有感慨：“此分明力窒华商之生机，而暗畅洋商之销路矣。”

此外，民族资本还深受官僚资本的排挤。由于官僚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许多部门都占据垄断地位，它们的资金、技术、设备等方面都具有极大的优势，这是民族资本无法与之抗衡的。

面对国内外强敌的夹击，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十分艰难，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畸形状态。首先，中国民族工业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发展水平很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没有占据优势。1920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为159.28亿元，其中近代工业产值为9.88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2%，只有手工业总产值44.45亿元的22.2%。

其次，轻重工业发展极不平衡，没有形成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主要是

纺织、食品等轻工业比较发达，重工业的发展十分落后。如当时中国人口约4亿，而每年生产的钢铁仅40万吨，平均每人每年只有1公斤。与其它国家相比就更加落后，以1919年平均每年每人用铁量为例，美国是0.250吨，英国0.130吨，日本0.040吨，中国仅为0.001吨^①。钢铁工业是一个国家强弱的重要标志，缺少了这个工作母机，也就无法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据统计，1949年全国工业总产值146亿元，其中轻工业产值103亿，占73.6%，重工业产值仅有37亿元，占26.4%。

第三，民族资本在地区上的分布也极不平衡，绝大部分近代工业都集中在沿海沿江地区，特别是少数大城市，广大内陆地区极少。占国土面积不到20%的东南沿海狭长地带，集中了全国70%的工业，占国土面积45%的西北和内蒙地区的工业产值仅占全国的3%，面积占国土23%的四川、云南、贵州和西藏，工业产值仅占全国的6%。根据1919年的官方数字，注册工厂共375个，其中在江苏的就有155个，河北57个，浙江42个，广东33个，山东31个，而广大的内地和偏远地区则很少或没有。

第四，民族资本经营的大多数企业规模狭小，资金短缺，技术设备落后，劳动生产率低，其结果必然导致企业严重缺乏持续发展的后劲，因而也就不可能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第五，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与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民族资本家的前身就是官僚、地主，因此他们不可能提出彻底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政治纲领，因而也就不可能有效地动员和组织广大农民群众这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

毛泽东指出：“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政治不改革，一切生产力都遭到破坏的命运，农业如此，工业也如此。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②

民族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的比重十分弱小，与中国这样的大国所应具有的规模极不相符。民族工业的不发达，造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使它不能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因而不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引起了近代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动，促进了新的革命力量即无产阶级的成长，由于无产阶级是一个最进步、最革命、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伴随着它的不断成长成熟，并迅速登上政治舞台，近代中国社会反帝反封建的重大使命，历史地落

①翁文灏：《铁矿纪要》，《农商公报》1919年第五卷，第11册。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页。

在了无产阶级的肩上。

二、趋于解体的自然经济

中国社会跨入近代以后，虽然产生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但封建的土地关系即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依然保持着，传统的农业经济仍然是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农业的主要生产方式，仍然是封建地主阶级把他们占有的大量土地，租佃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但却没能解决土地问题，而且随着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土地集中的现象更加严重。袁世凯在河南彰德等地有田产4万多亩，曹锟弟兄是天津静海一带最大的地主，还垄断了那里的水利机关。张作霖在东北占有土地150万亩，而且都是土地肥沃交通便利的优良地。不仅独霸一方的大军阀占有大量土地，各地各级大小军阀、官僚也都竞相瓜分土地。根据对1933年广东番禺县若干村的统计，地主占地为65%~90%，无地户占总户数的50%以上。1934年，绥远临河县无地户竟占75.2%。这些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一般是把土地分成若干小块租佃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向农民收取地租，地租额一般在收获物的50%以上，土地集中程度越高的地方地租率越高。四川新繁1935年的地租率达85.7%。孙中山曾愤怒地谴责这种制度：“中国的人口，农民是占大多数，至少有八九成，但是他们由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自己得到的几乎不能够自养，这是很不公平的。”“现在的农民，都不是耕自己的田，都是替地主来耕田，所生产的农品，大半是被地主夺去了……农民耕田所得的粮食，据最近我们在乡下的调查，十分之六是归地主，农民自己所得到的不过十分之四，这是很不公平的。”^①

由于封建军阀连年混战，导致军费猛长，税收激增，农民苦不堪言。1914年，山东、直隶两省借口治河而自征附税。1915年，北京政府令援山东、直隶两省之例，增加附税，以弥补财政赤字。1915年以后，旧附加税并入正税，又增加新的附加税。农民所受的盘剥还不仅是这些，因为实际征收的税额与政府公布的税额有很大出入。据广西《武宣县志》记载：“民国四年，广西巡按使张鸣岐通令全省清理田赋，各县奉令后，即遵照原有旧粮额数加倍或加数倍征收，得以博取奖赏，故各县中，仍有有田无粮，无田有粮，重益加重之弊。”^②此外，大小军阀还巧立名目，苛捐杂税，任意征收，人口要捐，牲畜要捐，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无一不要捐。

总之，在生产资料和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广大农民几乎完全用

^①《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10页。

^②《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565页。

旧式的手工劳动从事个体生产，农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生产所得绝大部分被地主剥夺，同时承受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连最基本的生存都难以维持，根本无力扩大生产规模和改进生产方式，只能在原始状态下，维持极其落后的农业生产。中国农村仍然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

随着资本主义侵略的深入，列强凭借其在政治上的种种特权和经济上的雄厚实力，使其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急剧增加。物美价廉的机器纺纱的大量输入，导致中国沿海沿江地区的手工棉纺织业纷纷破产。手工棉纺织业是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重要支柱，它的破产意味着中国部分地区的自然经济已经开始趋于解体。甲午战争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当这场战争还在进行时，恩格斯就曾预言：“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意味着大工业和铁路等等的发展使农业和农村工业之间的旧有联系瓦解，”“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① 甲午战后，资本输出逐渐成为列强掠夺中国的主要形式，资本输出又为商品输出开辟了道路。伴随着西方对中国廉价原料和农产品的掠夺，使中国农产品商品化的趋势有所发展，致使不少农村被卷入商品经济的漩涡。据史料记载：“今天，随便走进哪一家农户，人们都可以看到，曾经是不可缺少的纺车，都蒙上了尘土，被人遗忘了。一捆捆机器压的孟买棉纱似乎使人注意到手纺车已经不合时宜了。”^② 这表明，在甲午战前已经逐渐解体的自然经济，在许多地区进一步面临崩溃瓦解的境地了。

甲午战后，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中，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农业生产的商品化有了一定的发展，并进而形成了一些专业化区域，如出现了一些农牧垦殖公司。据不完全统计，从1902年至1912年，全国共设立了171家农牧垦殖公司，这些公司一般建在工商业或商业性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经营范围涉及农林牧副渔各业，基本上实行雇佣劳动制度，并采用机器生产。此外，在清末民初，我国农村还普遍出现了经营性地主。这些农牧垦殖公司以及经营性地主的出现，表明传统的自然经济开始进一步解体，农业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发展水平也很低下。在近代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然占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虽然也出现了一定的市场化趋向，但在整个农业经济中并不占主要方面，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依然是中国社会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88、297页。

^②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67页。

三、官僚资本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官僚资本源于洋务派创立的官办企业。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洋务运动，是在清政府受到两次鸦片战争的严重打击和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严重威胁的形势下，一部分洋务派官僚以自强求富为号召，企图采用西方的军事装备、先进技术和机器生产，以巩固清朝统治。洋务运动创办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其中的某些官员日后演变成了中国早期的官僚资本家。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洋军阀与官僚控制了一些矿山企业，使之成为官僚资本企业。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官僚资本的发展上。一是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有所发展。北洋政府接管了清政府所办的全部军事企业，此外，还新办了河南巩县兵工厂、湖南兵工厂等，还接收了清政府办的民用工业，成为这一时期官僚资本的一部分。如江南制造局船坞，辛亥革命时为沪军都督陈其美接受，1912年4月移交北洋海军部，改称江南造船所，到1918年，又“接添新厂一座，与旧厂衔接合用发动机，以便工作，陆续添置各种机器”。并以官办或官商合办的形式创办了近40家民用企业和矿场。二是官僚私人资本的发展。北洋时期的官僚私人资本，不仅经营金融业，如银行、银号、信托公司、保险公司等，也在有利的情况下向工矿业投资。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在各地方的军阀、官僚政客中有很多人都经营控制近代工矿企业。如黎元洪投资的山东枣庄中兴煤矿，是当时中国的大型煤矿，徐世昌、张作霖等都有资本。这种官僚企业享有运费、税捐等各方面特权，因而盈利较高，民族资本无法与之竞争。

北洋政府也搞一些官商合办的企业。1915年周学熙开设天津华新纱厂，定资本洋1600万元，官股40%，商股60%。当时的论者就指出：“今华新纺织公司于创办伊始，虽名为官股十分之四，商股十分之六，而其企图之志，实则在垄断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之棉业权利，然非先送政府以巨款，以救其燃眉之急，不能得此专利，此可断言也”。^①实际上就是官商勾结打压民族资本。据统计，1912年至1916年，主要军阀投资的工商业有37家。

北洋时期的官僚资本与帝国主义资本紧密结合。如1918年成立的中华汇业银行就是中日合办的。该银行是日本寺内正毅内阁为扶植皖系军阀而设立的，规定资本总额1000万日元，每股100日元，1919年第一次股东大会时，总股数为83790，其中日本44900股，中国38890股。在中国股份中，段祺瑞占3000多股，章宗祥3000多股，陆宗舆1000多股，冯国璋1000多股，交通银行5000股，中国银行5000股，东三省官银行1000多股。^②这一时期的官

^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664页。

^②吉迪：《北洋军阀政客资产记闻》，《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1期。